

# 疾病與身分的辯證：論戰後鍾理和的 療病日記與文學重述

羅詩雲\*

## 摘要

1946年8月鍾理和（1915-1960）返臺後不久即發現身患肺結核，於1947年兩度北上療養，期間日記寫作和文學創作仍持續不輟。逝世前更重新回顧病中生活，創作〈手術臺之前〉、〈閣樓之冬〉、〈楊紀寬病友〉等短篇。疾病向與社會變遷極為密切，不僅表徵身體與文化之間的認知連結，也涉及主體經驗和身分管理的相互關係。鑒此，本文就戰後鍾理和臺北的肺病療養（1947-1950）為考察時段，以此間經驗所著的療病日記和文學作品，討論失能主體的感官、肢體、情緒、心智之互涉運作，呈示作家以身體為敘事空間的主體再現與文化處境；論文結構上，首先整理戰後初期鍾理和返臺生活與創作，探究其療病前後的心路歷程與日記書寫；再者，由鍾理和的疾病文學展開討論，比對北上療病期間與逝世前之文本書寫，析論疾病對個人／社會的身分辯證與語言除魅；最末，綜論鍾理和疾病書寫的敘事能動性。鍾理和疾病書寫的「身體」是病患主體性的象徵，也是敘事話語的場域。本文意由鍾理和文學的肺病記述，析論融合身體經驗與私語言說的自我覺察與身分敘事。

關鍵詞：鍾理和、疾病、身體、污名、主體性

---

\* 致理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 **Dialectics of Disease and Identity: Exploration on Chung Li-Ho's Recuperation Diary and Literature in the Postwar Period**

Lo, Shih-Yun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Chihle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Abstract**

Chung Li-Ho was diagnosed with tuberculosis shortly after returned to Taiwan in August 1946. He continued writing and produced short essays during treatment: *In Front of the Operating Table*, *Winter in the Attic*, and *Patient Yang Ji Kuan*. This paper discussed Chung's dairy and literature while receiving treatment in Taipei in the Postwar Period (1947-1950). Specifically, it explores the mutual effects between Chung's sense, body, emotion, and thoughts when he experienced physical dysfunction because of tuberculosis, thereby describing the author's treatment life and cultural situation. First, compiles Chung's works and daily life records upon returning to Taiwan and examines his experience and diary before and after receiving treatment. Next, discuss Chung's disease-related literature works and compare the content during treatment and before death. It facilitates the dialectics and disenchantment of the relationships of disease with the self and society. Finally, it summarizes the narrative agency of disease-related works created by Chung. In these works, the body represents the subjectivity and serves as the field of narrative discourse. Describing Chung's literature on tuberculosis clarifies the narrative performance and self-perception that integrates physical experience and private language.

**Keywords:** Chung Li-Ho, Disease, Body, Stigma, Subjectivity

# 疾病與身分的辯證：論戰後鍾理和的 療病日記與文學重述

羅詩雲

## 一、前言：戰後初期的作家生活與創作

疾病和人類歷史發展息息相關，更與社會變遷的狀況彼此影響。戰後臺灣接收政府未妥善處理防疫與檢疫措施，且米糧與民生物資缺乏、物價高漲的情況下，造成傳染病的流行與死亡率的上升。戰後初期肺結核屬於臺灣流行病之一，但 1950 年代政府始對肺結核採取積極的防治計畫。至 1952 年治療特效藥發明前只得採用消極的休息療法，致使戰後初期臺灣大眾對肺結核的認知是充滿恐懼的不治之症，具高度傳染性的生命威脅。<sup>1</sup>疾病是每個人共同的生物性經驗之一，慢性傳染病的結核病又是因貧窮、營養不良和生活環境差而好發的疾病；1946 年發病、1950 年長期療養的鍾理和處於臺灣肺結核防治計畫初期的過渡期。內外因素交疊下，肺結核對鍾理和（1915-1960）而言可謂影響甚深，化作經驗感受和思維方式的因子。作家療病過程中所著作品，內容涵蓋戰後初期返臺的自我景況、社會觀察與療病生活。鍾理和仿以醫生記錄療程的「疾病誌」(pathography) 敘事模式<sup>2</sup>，從病人主觀角度記錄療病

<sup>1</sup> 結核病史重要關鍵是 1952 年口服抗結核藥開始在臺灣使用。結核病仍是戰後臺灣流行的傳染病之一，其防治工作的推展與政治、經濟變遷有密切關係。戰後臺灣結核病防治不僅有專責機關負責，亦讓美國和 WHO 主導的國際組織參與物質與技術的支援，半官方色彩的防癆協會也有協助。戰後初期以源於日治時期防癆機構的松山療養院、臺南縣立結核病療養所與新立的嘉義結核病防治中心為主要結核病防治機構。日治時期松山療養所主要功能是住院療養隔離病患。本文討論對象鍾理和就以松山療養院為療病處。張淑卿：《防癆體系與監控技術：台灣結核病史研究（1945-1970s）》（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頁 4-12、93-95。

<sup>2</sup> 「疾病誌」(pathography) 寫作即是敘事行動的一種，被視為一種敘事文類，以疾病為本體或以病人為敘述對象，旨在描繪疾病、治療、甚至死亡的個我經驗，可視為傳記或自傳體的次文類，一種關

經驗，包括病症診療、心理變化、醫病關係等面向。可知疾病為探討戰後鍾理和不可抹滅的存在，各以日記、小說、散文、書信等體裁再現或重述，觀照了內在個人與外在社會的狀態。

1938年赴瀋陽進入滿洲自動車學校的鍾理和，懷著文化憧憬於1941年遷居北京，又於1946年3月底搭乘難民船，自天津、上海返回基隆，4月14日抵達高雄；然而揮別動盪中國，計劃在臺灣重新開始的鍾理和，1946年8月卻發現自己身染肺結核。<sup>3</sup>翌年1月肺疾惡化，於是北上進入臺大醫院診療，診療期間遭遇二二八事件，療病日記記錄了親身見聞，社會充滿緊繃的不安全感。1947年10月27日再度北上進入松山療養院，長期治療肺病，病中持續創作並有書寫日記的習慣，包括1949年5月10、11日留存之日記，以及1950年3月17日至10月14日間的日記。與此段療病經歷直接相關的文本，包括〈鯽魚、壁虎〉(1949.7.2)、〈同姓之婚〉(1949年底)、〈十八號室〉(1950，未完稿)、〈貧賤夫妻〉(1959.11)等散文和小說。至於〈手術臺之前〉(1959.12，未完稿)雖非鍾理和療病期間所著，卻是深刻描繪住院生活的日記體病誌，〈閣樓之冬〉(1960.3)、〈楊紀寬病友〉(1960.7)也是屬於同一時期的創作，明顯以1947至1950年期間的臺北療病生活為背景，故一併納入本文討論範疇，方能通盤掌握鍾理和疾病敘事之特性。

作家與文友書信提到海外在住期間是他全心投入寫作的階段，且時局的不安全感更令鍾理和專注文學，同姓之婚的社會壓力和被經濟問題壓迫的苦悶也驅使他以文藝發洩心中情感。<sup>4</sup>彭瑞金分析鍾理和的書寫是以人際對應關係為思考起點，此正應

---

於「我」的書寫。若由疾病影響的角度來看，人於面對疾病時的反應和行為，不僅表述內在身體的狀態，甚至有觀照內在個體或外在社會的縮影，如此疾病書寫便拉抬至更大的社會性架構之中。李宇宙：〈疾病的敘事與書寫〉，《中外文學》31：12（2003.5），頁53。

<sup>3</sup> 鍾理和：〈復活〉，收入鍾怡彥主編：《新版鍾理和全集2》（高雄：春暉出版社，2009），頁165：「沒有想到正當孩子彌月那天，天剛破曉，我便咳血了，於是把一個應該快樂的日子弄得冷清清、愁慘慘。」由引文推論時為1946年8月，鍾理和初任內埔中學國文教師第一學期。

<sup>4</sup> 彭瑞金：《鍾理和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頁13：「同姓之愛是一個主要的思想起點，所見的是一個人與家庭、個人與社會，乃至人與人之間的對應關係，很自然地，人也就成了他思考的主體。」關於文學對於鍾理和的生命意義與價值思考，另可參見鍾理和：〈鍾理和自我介紹〉，《新版鍾理和全集8》，頁277：「但不幸，我們都是同姓。我們受到舊社會壓力之巨和為貫徹初衷所付代

和高夫曼（Erving Goffman）對「污名」（stigma）概念的討論框架，設定於由社會關係與特定情境所界定的身分狀態。可以說鍾理和的疾病書寫亦是通過「敘事」的中介作用所形成的一種自我身分，即便患病仍保持對臺灣社會的關注和閱讀創作，展現作為知識分子的責任；健康的定義不僅是疾病或羸弱之消除，還包括身體、心理及社會都處於完全安寧的狀態，故疾病牽涉的不只是身體的問題，也是個人生命狀態的反映。換言之，「身體」是自然秩序與文化秩序在人身上的會合點。而鍾理和的疾病書寫呈現了醫學與個體心理、生理及文化價值的互涉：包括社會生活所共享的規範性期待，如主流價值下個體必須維持健康、身體健康才能回歸家庭，以及倫理傳統價值對同性婚姻的病態譴責及污名化的人格投射等，這些期待莫不促使鍾理和力抗疾病以追求社會規範的「正常」狀態。<sup>5</sup>

關於鍾理和的研究成果甚多，以疾病書寫為主軸的前行研究分為兩類：其一是由文本論述鍾理和的創傷經歷和生命精神，其二是以文學治療角度詮釋作家疾病書寫。<sup>6</sup>本文除了連結作家生平與戰後生活，並輔以高夫曼的污名概念以深化前行研究

---

價之巨，是無法在這裡形容的。這是我生平又一次大刺激；被壓迫的苦悶和悲憤幾乎把我壓毀。這時候我兄弟那句話開始對我發生影響了，我想藉筆來發洩蘊藏在心中的感情的暴風。這思想把我更深的驅向文藝。由此時起要做作家的願望開始在心裡萌芽起來。」

<sup>5</sup>〔美〕高夫曼（Erving Goffman）著，曾凡慈譯：《污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臺北：群學出版社，2010），頁5、150-151。高夫曼指出污名大致分為三種類型：身體方面、個人性格與族類宗教的污名。他認為當社會共享的規範性期待被打破時，就會引發受污名者執行修復的措施，直至規範性困境停止並且修復損害。

<sup>6</sup>關於鍾理和疾病書寫的前行研究，第一類參見林秀蓉：〈與白色瘟疫搏鬥的眾生相——鍾理和疾病書寫探析〉，《高雄文化研究》2005（2005.7），頁259-282。首篇整理鍾理和疾病書寫議題的論文，林秀蓉詳論鍾理和所有關於肺結核的文本，整理其書寫的六大面向：貧病交迫的家庭悲劇、描繪身心的煎熬、生死的決鬥、尋索生命的意義、傳送關愛的力量、描述醫病關係；洪玉梅：《鍾理和疾病文學研究》（屏東：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洪玉梅：〈鍾理和「疾病書寫」探析〉，《屏東教育大學學報》25（2006.9），頁327-357。討論鍾理和對己身、妻兒、文學人物的疾病書寫，且探討作家心理和藝術表現，運用鍾理和書簡輔助解讀；王珮真：《論鍾理和病體與書寫：以文類差異敘事為中心》（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臺灣研究教師在職進修學位班碩士論文，2012）。王珮真從日記、書簡、散文、小說分析病體與寫作的特色差異；蔡慧崑：〈鍾理和的生命觀照——以日記為主的探討〉，《南亞學報》37（2017.12），頁266-299。以日記為研究文本，參酌其書簡、散文、小說的自傳式描述，整理鍾理和關於疾病治療的觀察與調適，刻劃其疾病書寫與求生意志；第二類參見林玲燕：《從書寫治療看鍾理和生命情結的反思與超越》（臺中：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所碩士論文，2006）詳論作家生命情境和創傷經驗，聚焦疾病書寫呈現文學治療的除魅意義；王幼華：〈「泰利

所論<sup>7</sup>，亦求釐清鍾理和在 1960 年前後重述療病經驗的動機和改寫意義。考量肺結核療養屬極為個人性的體驗，牽涉心境和思慮的心理因素<sup>8</sup>，疾病書寫更是病患凝視且重構被疾病打碎的自我的心理行動。<sup>9</sup>故由鍾理和的疾病書寫，可深度呈現作家的主體建構，以及與他人關係組織、溝通的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過程。<sup>10</sup>論述架構，首先整理戰後初期作家返臺生活與疾病文本，接續探究其療病前後的心路歷程與日記內容；再者，就鍾理和的疾病文學展開討論，比對北上療病期間與逝世前之日記、文本書寫，析論疾病對自我／社會身分的關係辯證與語言除魅；最末，綜論鍾理和疾病書寫的敘事能動性。以鍾理和日記和疾病文本為研究核心，其意義之一為療病日記是療病當下動態的認知紀錄，此類私文書的思想文本傳遞了作家的自我凝視和社會觀看，能得到個人對於社會文化的調適和表達；意義之二為疾病是絕對孤立的個體身心經驗，加諸鍾理和創作深具自傳色彩，故其疾病文本無疑是日記之外，詮釋作家主體最直接的話語形式。據此，鍾理和的肺病記述不僅表達身體經驗與私語言說融會下的主體覺察，也呈現觀察、反思、建構自我身分的動態敘事。

斯曼」式的創作——以鍾理和為例》，《臺灣文學學報》12（2008.6），頁 143-158。王幼華以文學作為生命困厄的代替形象徵，詮釋書寫創傷的自我揭露和除罪消解，提供解讀鍾理和的新角度。

<sup>7</sup> 社會學分類上污名概念已運用在性別、族群、醫療和犯罪四大領域，尤其以醫療為最。此點符合本文對鍾理和書寫的討論主軸；再者，只要有身分常規的存在就會發生污名關係管理的過程，故污名的討論牽涉了個人身分以及社會身分的流動關係與策略。社會身分的概念讓我們可以思考屬性與刻板印象間的特定關係，個人身分的概念則可思考訊息控制在身分建構中扮演的角色。承此，以污名概念論述鍾理和的疾病書寫，將可表現作家對自我的感知過程與訊息操作的敘事能動性。孫中興：〈人間何處無「污名」〉，收入高夫曼著，曾凡慈譯：《污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頁 xiv、2-4、75-78。

<sup>8</sup> 雷祥麟：〈衛生為何不是保衛生命？民國時期另類的衛生、自我、與疾病〉，《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4（2004.6），頁 48-51。

<sup>9</sup> 師彥靈：〈「病志」——病患破碎自我的重構〉，《蘭州文理學院學報》3（2018.7），頁 82。疾病書寫是一種自我闡釋、修整、統合的敘事行動，呈現患者對疾病現象、主觀性、經驗性的一面。

<sup>10</sup> 「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意指個人「知道、瞭解、反省、思考」自己在「情緒、行為、想法、人我關係及個人特質」等方面的「狀況、變化、影響及發生的原因」。而自我覺察均以個人自我內在經驗為核心，或依循生理感官、肢體動作、情緒感覺、想法念頭以運作，故而呈現個人、家庭、社會、文化經驗等層次的自我狀態。參見陳金燕：〈自我覺察在諮商專業中之意涵：兼論自我覺察督導模式〉，《應用心理研究》18（2003.6），頁 61。

## 二、療病與書寫之前

鍾理和性格不喜應酬、行事低調，專注於文藝創作，因此旅外時期交際活動並不活躍：「旅居海外的九年間，我已經確立了自己的路線——文學，因而也就把全副精神和時間都化在修業和準備的工作上。」<sup>11</sup>然而面對 1945 年的時局變化，此前一直沉潛的鍾理和開始思考參與政治事務的可能，且深感青年努力與活動的重要性。這種於時代變遷下重新尋求自我定位，亟欲透過各種資訊管道攫取與社會之間的情感依附和關連的反應，鍾理和於日記進一步檢視原因：

戰勝與戰敗而今已鬧了一個月多，然吾尚未由此獲得清楚、而且實在的意義、感覺與態度，是不是吾於「誠」字上欠程度，即是否自己未曾完全把自己推進洶洶的現實裡面，抑或因為時局變得太快，並且太過超越了想像而使自己追隨不上。有需反省。<sup>12</sup>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正式宣佈戰敗之後，北京從所謂的淪陷區再度回歸中國管轄，短暫沉浸於光復喜悅的鍾理和其後卻未獲得相應的感覺，他檢討是否自己從未真正面對中國的現實，或是無法趕上時代腳步。這種不得其所的失落情緒，一方面緣於殖民地臺灣知識分子的被殖民身分已獲解放外，也與對向來被視為後進的中國本身遽然改變的不安感有關。因此，誕生於日治臺灣時空的鍾理和，面對無所適從的自己，選擇由自身檢視開始，努力以文學書寫、組織參與、時事評論建構與地方交錯、依附、共享的情感關係，面對時代；然而欲重新展開人生、揮別中國返臺生活的鍾理和卻見故鄉的破敗、身染肺結核，生命再次蒙上陰影：

臺灣光復的翌年夏初，我們敵不過鄉心的引誘，於是回到久別的臺灣，起初依照預定計畫留在高雄——那時我一個最小的兄弟便住在那裡。然後，又搬到我做事的任所去。**但是多麼不幸，不到一年，我生病了。**為了以後的生活著想，我們只好硬著頭皮，回到故鄉家裡去。那裡有我一份應得的產業，可資一家四口人的生計。這是當初我們沒有料到的一著。**我們懷著受難者的心**

<sup>11</sup> 鍾理和：〈致廖清秀書簡〉，《新版鍾理和全集 7》，頁 137。(1957.10.30)

<sup>12</sup> 鍾理和：《新版鍾理和全集 6：鍾理和日記》，頁 15。(1945.9.23)

情，登上火車。<sup>13</sup>（粗體為筆者所加）

此際疾病的纏身、生活經濟的考量，加上回鄉後面對家族親友的沉重壓力，讓鍾理和滿懷受難者的無奈心情。這親族的壓力即指倫理傳統價值對同姓婚姻的譴責及污名化的人格投射：「很不幸，我們都是同姓。這種愛情，在我們社會上一直被認作是一種罪惡，是不被允許的。它的性質不是條件上的，而是原則上的，這是一個道德問題。」<sup>14</sup>當初為了追尋婚戀自由遠奔中國的鍾理和，回到臺灣的決定雖然讓他一解盼慕已久的鄉心，卻也在精神上再次面對當初所逃離的封建壓力，加上患病造成生活的諸多困擾，故返鄉和尋得工作的喜悅只是一時：

我們在外面漂流的八年。在光復的次年，抗不過鄉心的引誘，終而回到南海的臺灣。但，苦難到了。在當難民被遣返的船上，廿天吃不飽、睡不好，和過份勞苦的生活，把我原就虛弱的身體毀壞了。因很快我找到了工作和小小的寄託之所而得的高興，也只有一個短暫的瞬間而已。<sup>15</sup>

〈楊紀寬病友〉一作同樣提到「勞累」的患病原因，忙於家庭和課業的楊紀寬同在松山療養院住院治療，卻為了畢業考將接近康復的身體再次破壞。<sup>16</sup>促成肺結核流行的原因除了患者本身的抵抗力低下，還牽涉了惡劣的社會環境因素，諸如貧窮、戰亂、生活不安定、流動人口的產生等。鍾理和所處的戰後初期臺灣明顯切合肺結核流行的環境因素，而 1938 年以降於滿洲、中國輾轉奔波的身心經歷則是患病的潛在因素。作家將生活環境與病因結合解釋，歸結出生活條件不好、身心過於勞累，方使身體抵抗力變差而罹病的關聯。

鍾理和日記內容，可以歸納為生命體驗和創作素材。<sup>17</sup>由戰後初期療病日記到 1960 年前後疾病題材的短篇創作，時隔了八、九年，鍾理和以疾病作為題材的發想，部分原因為文友的鼓勵。鍾理和在與鍾肇政的信中提及他正著筆日記體短篇〈爬上

<sup>13</sup> 鍾理和：〈同姓之婚〉，《新版鍾理和全集 1》，頁 93。

<sup>14</sup> 鍾理和：〈致廖清秀函〉，《新版鍾理和全集 7》，頁 136。（1957.10.30）

<sup>15</sup> 鍾理和：《新版鍾理和全集 6：鍾理和日記》，頁 140。（1950.5.10）

<sup>16</sup> 鍾理和：〈楊紀寬病友〉，《新版鍾理和全集 2》，頁 219-220。

<sup>17</sup> 彭瑞金：〈鍾理和日記——日記裡的文學〉，收入鍾鐵民編：《鍾理和全集 5》（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3），頁 272。

手術臺前〉，以參加《亞洲》徵文比賽。<sup>18</sup> 1959年9月鍾肇政寫給鍾理和的信函提及「即以兄的病危題材，亦當有不少可寫的」<sup>19</sup>，11月則又提出相似的建議：

兄應以自己的病為題材多寫，〈貧〉作便是佳例，這種體驗是不易有的，可貴的，我向來就奇怪，兄何以不用這種題材來發揮一番呢？我不曉得前此是否提起過（我好像好幾次寫信時都想提起，終於不忍提的），但這似乎是很值得嘗試的。<sup>20</sup>

鍾理和文學的屬性向來自傳性色彩強烈，充滿許多個人身分的訊息控制，並具現實關懷。鍾理和因為疾病、婚姻、民族、經濟等問題，其生命處境如受污名者般長久處於「接受」問題的困境中，他選擇醫療手術及文學直接或間接矯正他的狀態。<sup>21</sup>故其日記和文學的肺病記述並無美化傾向，而與生活經濟、家人關係、生命意義的創傷、挫折有關，其筆調傾向寂寞又悲壯的風格。

北上療養之前，作家藉散文描述甫罹病的自己徹夜失眠，壁虎嘶鳴令他聯想龍瑛宗筆下患著肺病的林杏南長子與潦倒的陳有三身影：「林杏南的兒子，已慢慢的，變成了自己。」<sup>22</sup>鍾理和甚至自喻幻化為林杏南之子，疾病不單使主體思緒充滿失落感，宿舍空間連帶充滿悵惘、淒涼、落寞的氛圍。作家一方面就龍瑛宗小說人物表述夢想被疾病剝奪的絕望，呼應自我生命困境，另一方面呈現病中為紓解內在情緒而感官超載的身心狀態，即相對表達出思緒感官超越拘束病體的自由；鍾理和投入疾病敘事的關鍵，在於藉由「書寫」能將罹病的受污名化之受害狀態轉為主動的自我述說，從而由文學書寫得到精神療癒和持續搏鬥的力量。同時，肺病治療的入院決定也表現為了自身和妻兒思考後自我矯正的積極行動：「為了你們，我臥病五年來，

<sup>18</sup> 鍾理和信中敘述日記體短篇〈爬上手術臺前〉寫到四千字便寫不下去。鍾理和：〈致鍾肇政函〉，《新版鍾理和全集7》，頁93-94。（1959.12.23、27）

<sup>19</sup> 鍾理和、鍾肇政著，錢鴻鈞編：《臺灣文學兩鍾書》（臺北：草根文化出版社，1998），頁235。

<sup>20</sup> 鍾理和、鍾肇政著，錢鴻鈞編：《臺灣文學兩鍾書》，頁245。

<sup>21</sup> 污名對個體的虛擬與真實的社會身分之間造成特殊的落差，大眾往往預設受污名者並非完整的人而施加各類歧視，致使受污名者產生「受害化」（victimization）的傾向。因此，受污名者可能直接嘗試或私下付出努力以矯正他視為缺點的客觀問題，甚至與現實斷裂而以不同於主流的方式詮釋社會身分。高夫曼著，曾凡慈譯：《污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頁10-14。

<sup>22</sup> 鍾理和：〈鯽魚、壁虎〉，《新版鍾理和全集5》，頁40。

忍受煎熬，嚐盡苦楚，誓與病魔奮鬥到底。」<sup>23</sup>

1947年1月鍾理和離家獨自展開肺結核的療養之路，卻遭逢臺北二二八事件的亂局，匆匆於3月離開臺大醫院返家，期間日記也多所殘缺，僅留三日紀錄。〈同姓之婚〉深刻描述鍾理和入院治療前的心路歷程，作家在第一次北上療病前多有猶豫躊躇，妻兒家人是他無法隻身離鄉的考量，但病況未有絲毫進展的困境讓作家決心入院治療：

日子在煩惱中滾流著，轉瞬間，半年過去了，而我的病，卻沒有絲毫進展。長此下去，何時痊癒，頗難預料。因此，我打算入院治療，平妹也同意我這樣做。半個多月前，我曾給臺北的朋友去信，請他院的狀況，和辦理登記手續。而今，朋友的回信到了，說是一切都已弄妥，叫我即可動身北上。可是教我如何忍心拋下她們母子呢？<sup>24</sup>

1949年底完稿的〈同姓之婚〉，述及鍾理和近三年前北上療養前夕，在庭前龍眼樹與妻兒們離別的景況，眼神視線和空間物景的交互流轉間，交疊襯托出濃厚的別情。畫面中共四對依依難捨的眼睛，一雙幼兒與不捨的妻子目送作家離開，走出庭園的作家不時回頭，只看見妻子微笑中藏著使人難受的淚水，唯一動態的物景是一旁慫慫揮別的龍眼樹梢。作家憶起這最後與家人相處的時刻，感慨說道：「三年了，就一直沒有回去過。天天，她們母子那冷冷清清相依為命的影子，不斷地在我眼前浮起！」<sup>25</sup>北部的療病生活令作家與家人兩地分隔，與世隔絕的療養院猶如隔離了作家的病體與意識，療病後之作〈同姓之婚〉呈現鍾理和心理時間仍停留在三年前的離家時刻，對家人的思念化為眼前的幻影不斷重現。

<sup>23</sup> 鍾理和：《新版鍾理和全集 6：鍾理和日記》，頁 143。（1950.5.10）

<sup>24</sup> 鍾理和：〈同姓之婚〉，《新版鍾理和全集 1》，頁 98。

<sup>25</sup> 鍾理和：〈同姓之婚〉，《新版鍾理和全集 1》，頁 102。

### 三、身體與病態：鍾理和日記的主體覺察

日記承載個人日常、社會生活與內心感受的紀錄，主觀性強、記述簡略，亦為連續性、跨時性的日常活動，相對表現書寫者的心靈活動或人格特質。彭瑞金描述鍾理和起筆日記動機來自內心的「激動」，根源環境時代的變局或個人生命的抉擇、挫傷<sup>26</sup>；而病態（illness）意為臨床診斷的跡象，包含主觀感覺的症狀和客觀發現的徵象，牽涉病患的主觀回應以及專業人士的診斷，具有無法化約的社會性。<sup>27</sup>本節將由身體與病態的表述角度，以鍾理和 1947 至 1950 年的療病日記為討論對象，包括 1947 年 2 月記於臺大醫院和 1949 年 5 月至 10 月 14 日記於松山療養院的內容，探究作家療病前後的心路歷程，與疾病之於自我、家庭、社會層次的重新組織：

#### （一）感官覺受的病態敘事

日治時期臺灣小說已不乏結核病的出現，其隱喻殖民社會中臺灣知識分子理想的追求與挫敗，也呈現崇高理想落空的疾病美學。<sup>28</sup>甚至鍾理和也用了龍瑛宗筆下患有肺病的人物林杏南長子自我比喻，寄寓生命或將走入終點的悲劇性。結核病的病程早期無明顯症狀，或感疲勞倦怠、食慾不振、午後發熱、久咳胸痛、夜間盜汗等，肺病的特殊性病徵除了長期、身體消耗、傳染性外，文化傳統上亦被視為一種「時間之病」，因為生命加速耗損而使病患得以擴大意識。<sup>29</sup>這種疾病特性在鍾理和日記

<sup>26</sup> 「他興發過將近二十次以上動手寫日記的動機，而且幾乎每一次都因為內心有所『激動』，有的『激動』來自大環境，時代的變局，譬如前述大戰結束和二二八事變，有的是他個人生命歷程中面臨的重大抉擇或挫傷，……。」彭瑞金：〈鍾理和日記——日記裡的文學〉，收入鍾鐵民編：《鍾理和全集 5》，頁 271。

<sup>27</sup> 「病態」的概念受到文化範疇深切影響而具備社會性，具有自然與文化、個人與社會、心靈與身體的基本關係辯證。〔英〕布萊恩·透納（Bryan S. Turner）著，謝明珊譯：《身體與社會理論》（臺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公司，2010），頁 234-235。

<sup>28</sup> 梅家玲：〈身體政治與青春想像：日據時期的臺灣小說〉，《漢學研究》23：1（2005.6），頁 46-48。日治小說描寫肺結核疾病的篇章，例如楊守愚〈一個晚上〉（1931）、王詩琅〈青春〉（1935）、朱點人〈紀念樹〉（1934）、浪石生〈面頰〉（1936）、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1937）、〈宵月〉（1940）等篇。

<sup>29</sup> 梅家玲：〈身體政治與青春想像：日據時期的臺灣小說〉，頁 47-48。

的疾病敘事中，相對表現的是患者感官及心理的細膩描寫。作為病患的鍾理和感知世界與自我的方式，主要可透過日記文本察知。日記承載個人日常、社會生活與內心感受的紀錄，特性上主觀性強、記述簡略，亦為一種連續性、跨時性的日常活動，相對表現了書寫者的心靈活動或人格特質；此外，寫日記此一持續性的日常實踐，或具有緩解此際生活的不確定性的作用。

身體的感官覺受是認識世界知覺運作的基礎，亦為文化感受和疾病的實踐場域。尤其論述疾病書寫定會牽涉身體內外變化的記述，疾病令人不斷意識到身體的存有。身體經驗更是多重感官的結合，牽涉身體長期與文化環境互動養成下的感知方式，因此身體感受同時包含感覺、意義與文化建構的問題。<sup>30</sup>而且住院治療期間經常發生孤立、無能的經驗，可讓人認識自我、看清處境，對生命產生全新的理解意義。<sup>31</sup>承此，鍾理和疾病書寫中的「身體」可視為病患主體的自我敘事場域及話語象徵，展現作家的自我行動並承擔敘事功能。在鍾理和的生命語境之下，肺結核疾病在連續記述的日記中被擷取或是描述的部分，即是作家身體經驗的內化表達，是以創傷後的身體表述對生理與心理轉折變化的主觀回應。

1947年10月，鍾理和住進松山肺結核療養院，接受近三年的長期治療，他經常流露罹患肺結核後，一切生活將告停擺休止的沮喪：「於是，一切——完了！學校辭職，和文藝界也失去連繫，當時自料不免一死，因以對人生無望，寫作更不必談了。」<sup>32</sup>寫作學習的孤寂摸索和療養生活的隔離、病榻上的消耗，折損作家的心志，與友人的信件話語同樣充滿失落：「我在一個人生涯中最為有用的少壯之年便罹患此疾，空讓大好時光虛擲，自思此生已無多大希望，今後倘能當名小卒，吶喊吶喊為

<sup>30</sup> 「感官」並非天生，而是文化學習的結果，人於其成長的社會環境習得各種氣味於社會所代表的價值及意涵，並依據這套內化的感知系統而做出適當的反應。而這套感知系統被研究者稱為「身體感」，原因在於這些感覺項目充分內化於我們的身體，形成身體能力的一環，不同個體因為文化的培養或適應環境而有部分能力上的差異。余舜德：〈「日常生活的身體感」專號導言〉，《考古人類學刊》74（2011.6），頁1-10。本節論述意在從鍾理和形塑身體能力的身體感官經驗論起，以探知作家內在文化認知之一隅。

<sup>31</sup> 高夫曼著，曾凡慈譯：《污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頁48。

<sup>32</sup> 鍾理和：〈致廖清秀函〉，《新版鍾理和全集7》，頁112。（1957.3.22）

文壇添點熱鬧，於願足矣！」<sup>33</sup>這種沮喪或失落感亦反覆出現於日記，不斷敘述疾病讓他失去友人和正常的生活；然而「失去」的感覺固然纏繞左右，卻未真正打倒鍾理和對生命與文藝的期望及奮鬥。作為自我疾病書寫的第一觀眾，鍾理和忠於自己的文學觀，以文學揭露主體真實的病態<sup>34</sup>，將身體比喻戰場，視疾病為敵人而奮鬥。

疲勞衰弱、咳血、咳痰、臉色蒼白、面頰潮紅都是肺結核的體表症狀，連帶引發敏感、易激動、煩躁等特殊心理反應。相對於正常的健康狀況，疾病成了種非正常狀態的社會偏差存在。在自己或是病友們每一次病徵發作或是手術前後，鍾理和都有深刻的感官覺受，例如氣管呼吸不順，喉間猶如卡著玻璃片像風箱般開閉：「因呼吸而直接和大氣聯繫著的肺病，看來將永遠隨天氣晴晦寒暖而發生變化，無法擺脫大氣的影響的。」<sup>35</sup>因療養無法回到故鄉與妻兒團聚，更無法自主操控患病的身體，每一口呼吸都強化作家被疾病擺弄的感受；然而療養院的病友們仍無一不抱持著康復的希望：

這裡是怎樣毫無掩飾地表現著倔強的、堅韌的、頑拗的生存感，生命力呀！  
岩石下面的草，是那麼孱弱的，但孱弱的組織裡卻賦有著堅強的生命，它寄託在葉尖上，使得觸角是那樣的敏銳與蠻強，不惜蜷曲旋轉，鑽探而伸出到有陽光的地面去。人——像李君，和這草，究竟有多少距離！<sup>36</sup>

病友冒著毀壞身體求活的風險，但身體狀態、聲音、咳嗽、痰量顯示手術結果是失敗的。縱然如此，病友為求生不惜冒風險動手術的掙扎，一如於環境中拚命延展觸角至陽光面的岩下的草，身軀雖然虛弱卻有頑強的意志力。病友開刀後的疤痕和塌陷的身軀令作家對現代醫療產生讚嘆、驚恐的心情外，更強烈感受到人類對生的掙扎與執著，感嘆人與岩下小草景況之相似，療養生活令作家思緒與感官益加細膩且

<sup>33</sup> 林海音：〈悼鍾理和先生〉，《新版鍾理和全集 7》，頁 137。(1957.10.30)

<sup>34</sup> 鍾理和的文學觀及對書寫的堅持可從文友書信探知一二，即便身體疾病造成極大的生活、精神困擾，卻始終不放棄寫作，力求刻劃真實，追求主題的社會價值。鍾理和寫道：「一場病，我已歇了一個多月了，什麼都已荒廢，不過能夠再執筆，則其餘也不須再計較了。……文學是假不出來的，我們但求忠於自己，何必計較其他。」鍾理和：〈致鍾肇政函〉，《新版鍾理和全集 7》，頁 53。(1958.11.19)

<sup>35</sup> 鍾理和：《新版鍾理和全集 6：鍾理和日記》，頁 103。(1950.4.7)

<sup>36</sup> 鍾理和：《新版鍾理和全集 6：鍾理和日記》，頁 80-81。(1950.3.19)

敏銳。

療病日記裡的病徵與治療代表鍾理和對疾病的觀察與戰鬥，開刀前後的記述通常特別呈現心境變化。例如與病友手術前夕互相勉勵的話語，彷彿是即將走上前線的勇士，表露了對抗疾病的意志：「為實現某種理想的勇士們的，和為擺脫某種心理上的苦悶而自殺的、視死如歸的精神。……接受開刀而決然爬上手術臺的肺病人，是兼有這兩種精神的；一邊是擺脫，一邊則是實現！」<sup>37</sup>擺脫（疾病連帶的經濟、生活、家庭、事業影響）、實現（恢復健康）是鍾理和接受手術的兩大原因。手術的生與死是病人全權承擔，不畏周遭病友失敗手術的警例，鍾理和相信生命的堅強和力量。作家在疾病帶給身心的挫敗中持續自我激勵，因此文字情緒起伏大；然內容不乏恐懼、憂慮的感官或心理抒寫，比如為舒緩因頭痛、胸悶的失眠而服用紅色安眠藥片：「忽然覺得吃的並不是藥，而是紅色；回頭不會由內臟紅起，紅出皮膚外面來麼！」<sup>38</sup>鍾理和描述自己吃的不是藥而是紅色，彷彿內臟、皮膚、腦海都將冒出大片的紅。紅色意象鮮明的呈示於身體和思緒，隱喻了血液、危險與警戒的意義，呼應肺病患者久病難癒、憂愁恐懼且時時備戰的身心狀態。

手術其實包含了身體及疾病的理論，不單是一種實際程序的操作。因為 1950 年前後臺灣肺病治療技術的背景演進，鍾理和尤其詳細記敘關於肺部手術和病患自身生活控制的療養過程<sup>39</sup>，例如對人工氣腹與胸廓成形術的紀錄與感想：

林新澤先生再來勸開刀（胸廓整型術）。問題倒不是決定與否，而是在何時開刀。一個病人，爬到手術臺之間，是必須做下許多事情的，並不很簡單，祇有病人自己知道。而醫師則以為醫學上的問題既已解決，祇要動起解剖刀向

<sup>37</sup> 鍾理和：《新版鍾理和全集 6：鍾理和日記》，頁 123-124。（1950.4.28）

<sup>38</sup> 鍾理和：《新版鍾理和全集 6：鍾理和日記》，頁 113。（1950.4.13）

<sup>39</sup> 在 1950 年代有效化學藥物治療之前，結核病主要治療方向是在飲食營養與肺部手術上增加病患抵抗力，避免身體勞動與病肺的萎縮療法。肺結核的萎縮療法（collapse therapy）十分普遍，主要藉由人工氣胸（artificial pneumo-thorax, APT）、人工氣腹（artificial pneumo-peritonium, APP）、胸廓成形術（thoracoplasty）或合併肺葉切除等手術，改善肺內空洞塌陷或切除，降低結核菌繁殖速度或數目，以控制病情。上述手術雖獲得一定治療成效，但伴隨許多外科手術的後遺症。陸坤泰：〈化學藥物療法之前的結核病治療〉，《防癆雜誌》秋季號（2013.9），頁 6-10。

飯匙骨下一劃，瓜熟蒂落，如此而已，毫無困難。<sup>40</sup>

上述引文呈現醫務人員往往偏重患者的身體而忽略人的主體，亦偏重患者的疾病而忽略他們的病痛經驗，醫病之間從而產生疏離的狀況。胸廓整型術是肺結核藥物治療之前常用且永久性的塌陷治療，於骨膜下切除肋骨維持肺部塌陷以控制病情。鍾理和面對如此重大的外科手術並不退縮或恐懼，他擔心的是接受手術前醫學事務外的處理與決定。在這段記述後，鍾理和敘述了猛禽大冠鷲獵食、劫掠生命的剎那畫面，對應前文林醫師勸導自己動手術的段落，呈現了醫師和病人看待生命輕重的態度差異。

醫生與病患之間的關係其實是帶有衝突性質的動態協商過程，病患本身對疾病的指認以及醫護人員對症狀的判定，雙方都力圖傳達彼此對病態的定義。於此，鍾理和日記呈現醫學侵入他私人的生命空間，以及所延伸關於生命價值與身體狀態的思辨：必須成為健康的正常人、身體健康才能與家人團聚、回歸家園，以及社會傳統價值對同姓婚姻的病態譴責和道德批判等壓力，都促使鍾理和必須力抗疾病、恢復健康，追求相符社會主流價值的「常人」狀態：「決定生死的手術，原就帶有悲劇性的；但也可見自己的感情，卻是極其平凡的一種，是與常人共喜怒哀樂的。」<sup>41</sup>（粗體為筆者所加）作者藉病友之例，闡述病人對於疾病所引起苦惱的畏懼正是接受手術的原因。對鍾理和而言，手術是他解決疾病、追求正常、開啟新生的唯一選擇，開刀讓他如常人般正視生命的存在與死亡的意義，故手術前夕情緒不禁激動，夾雜悲壯、嚴肅、緊張的複雜心情：

生也罷，死也罷，我已到了必須選擇取其一的時候。你們是還應該活下去的人，我不能總拉住你們不放，讓你們和我同歸於盡。……數年來我忍盡和受盡了一切煩惱和折磨，祇希望能早一點恢復健康，給你分憂……我是這樣的愛你，祇因為它，才使我雖病了也能活下來，才使我數年來能夠制服在痛苦時不住困擾我的自殺的念頭。同時，像這次一樣的，也使我很勇敢的去接受

---

<sup>40</sup> 鍾理和：《新版鍾理和全集 6：鍾理和日記》，頁 111。（1950.4.10）

<sup>41</sup> 鍾理和：《新版鍾理和全集 6：鍾理和日記》，頁 120。（1950.4.22）

決定生死的手術。<sup>42</sup>

面對生死交關的手術，手術前一日作家日記爬梳身邊事物和人際關係，逐一寫下對孩子、手足、妻子的愧疚與回憶。生命無所依靠、無施力點的寥落，呼應病中日記裡病室收音機上如船般的茶杯擺飾。除了術前日記，療養過程的日記亦見作家結合過往由中國遣返臺灣的船旅經驗，以相關意象闡釋飄盪無所歸的孤寂、勞苦：「我們的船，便是在這裡飄著、流著，向著令人不能相信的，虛無縹緲的地方駛去。來也茫茫，去，更不知歸於何所？」<sup>43</sup>可知船的記憶和意象對鍾理和而言是關鍵的，他亦藉病室窗前猶如帆船的茶杯，比喻自己將完成治療療程的意志：「它是會完成它的航程的！」<sup>44</sup>如帆船般的茶杯在陽光的照射下顯得穩健又自信，一如此際即將展開療程的鍾理和，內心尚充滿希望。

除了外科手術外，「控制」是肺結核慢性病患者日常生活的另一重要課題，鍾理和日記散見對診療、病徵或身體狀況的描述，諸如 X 光、氣腹、失眠、頭痛、呼吸、血壓、脈搏等病態或數據之紀錄，致其文字存在著一種控制感。<sup>45</sup>此般控制感除了顯影於作家病程中對疾病本身之主客觀記述外，還包含日常生活的天氣環境、精神狀況與其他維持常規生活樣態的活動，例如書籍閱讀、病友交際、讀報抄寫、時事評述。鍾理和面對戰後初期臺灣時局動盪和生活變化，產生身分、情感和經濟上無所適從的不安，此際疾病的衝擊又加重作家對生命無從掌握的失落。面對時局、身分、

<sup>42</sup> 鍾理和：《新版鍾理和全集 6：鍾理和日記》，頁 137。(1950.5.10)

<sup>43</sup> 鍾理和：《新版鍾理和全集 6：鍾理和日記》，頁 138。(1950.5.10)

<sup>44</sup> 鍾理和：《新版鍾理和全集 6：鍾理和日記》，頁 76。(1949.5.10)

<sup>45</sup> 相關記述除了病態症狀的形容，通常記有數據，包括「第二次人工氣腹，三百五」(1949.5.11, 頁 76)、「晚，微熱，三七度三」(1950.3.20, 頁 82)、「氣腹，一千；透視，空氣在七八肋骨」(1950.3.22, 頁 85)、「氣腹，空氣仍在七八肋骨。血沈一小時七，二小時二十一」(1950.4.5, 頁 101)、「失眠。——頭重，胸痛，心跳……。(中略)人工氣腹，一千二百」(1950.4.13, 頁 113)、「體重四十公斤。前個月三十八。」(1950.4.17, 頁 116)、「肺活量只有一千三百！」(1950.4.19, 頁 118)、「透視。已經一星期不打氣腹了，而空氣仍毫未少減——在七八肋骨」(1950.4.26, 頁 112)、「肺活量增加到一千六百。血壓百零四，略低，脈搏九十上下，稍快；但運動後回復亦快。呼吸停止時間，三十秒。血素七五%，赤血球，三百九十八萬。白血球，八千三百。」(1950.5.1, 頁 130)、「血沈速度為一小時十八，二小時四十」(1950.5.9, 頁 135)、「身長一·六〇米；已經縮矮了許多。過去我是一·六二米的。」(1950.5.10, 頁 146)等。

身體等方面的劇變未定，療病中的作家積極以文學書寫及閱讀建構時代感與社會關連，也凸顯身為受污名者的鍾理和亟欲掌控個人身體與社會訊息的反應。日記記述模式由景而事，再推移至己身狀態或重要事件的紀錄、感想，此正表現了作家追求或營構常態／健康生活的思緒和作為。

## （二）斷裂與疏離：個人生命史、身心意識、自我價值與認同

疾病透過疼痛侵蝕身體，對個人身體的尊嚴、完整、價值進行拆解，因此疾病書寫的意義在於：「它不僅是個人因外界病原或內在體質而進入某種脆弱狀態的表稱而已，還是觀照個體內在或自然社會的縮影或反射。」<sup>46</sup>換言之，將疾病作為書寫的對象時，寫作便進入一個更大的社會性架構，疾病不再停留於個人層次，而是對社會現象或作家意識的一種折射。鍾理和的療病生活不僅是軀體進入療養院，更帶著價值判斷和思想經驗一同進行修復觀照，因此日記描述的病程及療程都投影了個人心境與文化鑄模：「肺病的悲劇，肺病人的苦惱，在疾病自身者少，在因患病之故而引起的心理和環境的變化者多。」<sup>47</sup>疾病的衝擊不只是病患本身，更連帶影響周遭的人事物。肺結核病患的悲劇在於心理和環境上產生極大改變和斷裂，尤其對家人、經濟與生命方面的長期煎熬。鍾理和疾病書寫的斷裂感呈現於個人生命史與日常時間、身心意識與周遭環境、自我價值與認同等層面。

生命史與日常時間的斷裂，尤其呈顯於鍾理和念及家人，而欲求康復返家的想望，以及病友與家人關係變化的敘事：「一個人一旦倒下，問題也就接著來了，拋開經濟不談，就還有生活、家庭、事業、理想……這些原為他所有的，或將為他所有的，現在卻都離開他了。」<sup>48</sup>肺病讓自己成為扔下妻兒的人，尤其療病期間孩子患病更令鍾理和寢食難安，充滿羞愧。擁有事業、理想的想望遙不可及外，自我的生命循環經歷更與家人完全分離。如此悲劇同樣發生於療養院病友身上：「謝君夫婦談到很晚才走。……在現實前頭，一對可憐蟲相對而泣。他們此去，似乎只有仳離一途可

---

<sup>46</sup> 李宇宙：〈疾病的敘事與書寫〉，頁 53。

<sup>47</sup> 鍾理和：《新版鍾理和全集 6：鍾理和日記》，頁 115。（1950.4.16）

<sup>48</sup> 鍾理和：《新版鍾理和全集 6：鍾理和日記》，頁 124。（1950.4.28）

循。」<sup>49</sup>肺結核長期療養的必要和隔離方式讓病患須與家人分居，加諸醫療費用的經濟與養護問題，往往催化家庭關係的破滅。鍾理和於日記評價這是屬於肺病人全體的悲劇與現實，且將持續搬演下去。

三年的歲月和隔離的療養生活致使鍾理和無法掌握家人音訊，也無力顧及家人生活，故其返家相聚途中的心境顯得猶疑不安，這也是病人生命週期與日常時間落差下的影響：

我離開家住到醫院裡，整三年了，除開第二年平妹來醫院探病見過一次，就再沒有見過，三年間無日不在想念和懷戀中捱過。我不知道這三年的日子她們在家裡怎樣度過，過得好？或不好？雖然長期的醫藥費差不多已把一份家產蕩光，但我總是往好裡想她，也許並不是想，而只是這樣希望著也說不定。我願他們過得非常之好，必須如此，我才放心。<sup>50</sup>

引文是因病入院離家三年的鍾理和終於返家的段落，鍾理和滿懷對家人的思念和焦慮，思緒中以自我提問呈現對家庭家人狀況的不了解，語氣亦為未盡扶養和保護的內疚成分居多；類似的想法與口吻亦出現於〈復活〉：「過去數年間，她們母子好像住在別的星球，我所知者甚少，我不知道她們怎樣活下去，孩子的成長啟開了我的自私之門。讓我窺見一直為自己所忽略的許多嚴肅而悲壯的事情。」<sup>51</sup>這段話一方面表述作家三年的療養院生活過得孤立隔離，摯愛家人猶如住在遙遠星球般音訊全無，另一方面則呈現療病中的自己與家人之間的疏遠，則有自我譴責的意味。因疾病而對家人歉疚的負罪感同樣出現於文友書信，特別是連累家人罹病的懊悔亦深重至令人感到可怕：「三年的歲月，使我回家來時發現我的家庭已經變得十分可怕了。」<sup>52</sup>受到妻子沉重的經濟負擔、長子害病的殘廢和次子的病逝等接連打擊之下，貧病交迫的生活艱困讓作家對妻兒時常懷抱哀憐、虧欠的想法，卻也無力彌補、充滿無奈，唯一能做的是接受成功率不高的手術。

<sup>49</sup> 鍾理和：《新版鍾理和全集 6：鍾理和日記》，頁 77。(1950.3.17)

<sup>50</sup> 鍾理和：〈貧賤夫妻〉，《新版鍾理和全集 2》，頁 128。

<sup>51</sup> 鍾理和：〈復活〉，《新版鍾理和全集 2》，頁 166。

<sup>52</sup> 鍾理和：〈致廖清秀函〉，《新版鍾理和全集 7》，頁 138-139。(1957.10.30)

疾病影響身體狀態，致使身體知覺發生變化而造成認知混亂，從而產生無助感。或失去部份身體的行為能力，又令患者感到被邊緣化以及禁錮閉鎖<sup>53</sup>，與環境、社會失去互動而逐漸消解了關係連結，專心療病的鍾理和便曾感嘆疾病使他失去了友人；「療養院」是構築鍾理和 1947 年 10 月以來疾病書寫的重要場景，在戰後臺灣抗結核病藥物尚未普遍之前，患者的治療方式主要以療養為主。針對肺結核的病徵，療養所設址條件著重空氣新鮮與日光充足的地點：

據說我們是有了病的人，已經是和社會斷絕情緣了，於是在我們周圍築起了一道圍牆，隔開來。牆內和牆外是分成兩個世界了；這裡有著不同的生活、感情、思維。而牆前圍植的、如帶的一環油加里樹林，則不但加深了兩個世界的距離，而且是愈見其幽邃和隱約了。

我們由掩映的樹縫間望出去，人間即在咫尺；由那裡我們失去了的生活、人情、恩愛、太陽、事業，不斷向我們招手。<sup>54</sup>

鍾理和描述療養所內外之間被築起一道牆，外部世界是病患失去的日常生活，內部是與社會斷絕關係的病患，唯一的現實連結是在空氣中吸入的工廠、火車煤煙。療病日記描述了主體生活與社會空間的場域隔離，生活、人情、事業不斷於咫尺之外展演，但病人與外部一切都是隔開的。連療養院內男女病友的活動空間也呈隔離狀態，讓鍾理和感慨受父權壓迫的女性地位，訝於療養空間也存有傳統的性別秩序劃分，井然相隔的男女病室成了男女平權的諷刺：「離真正婦女解放，大概還該有一段很長的時間的！」<sup>55</sup>承此，當作家住院以來首次外出至青島路的防治中心，平凡街頭的事物景觀也如變異的奇景，車流、行人、天空、婦人髮型、說話用語都令人產生異樣。

鍾理和經常於書信中自述環境、體力、時間和一些實際事情，限制了勞動、寫作和情緒的投入，讓家庭、生活、事業現實充滿憂愁、疾病和苦悶：「身體正合俗語

<sup>53</sup> 師彥靈：〈「病志」——病患破碎自我的重構〉，頁 83。身體知覺、行為能力和他人態度都會影響患者的自我觀感和感情情緒。

<sup>54</sup> 鍾理和：《新版鍾理和全集 6：鍾理和日記》，頁 124-125。(1950.4.28)

<sup>55</sup> 鍾理和：《新版鍾理和全集 6：鍾理和日記》，頁 106。(1950.4.8)

說的『小病不離身』幾無寧好之時；生活汲汲不可終日像永在風雨之中。」<sup>56</sup>狀況甚至嚴重到令人產生對執筆目的的懷疑，而鍾理和書信所述的這些問題可推知是與肺病相關。肺病所延伸的其他連帶病痛，諸如消化不良、神經衰弱、失眠都十分惱人，1946年以來這場疾病徹底且持續打擊作家的生命，精神所受的磨難遠超過身體所能承受的：

那裡面的人的變化，使我大吃一驚。這難道便是我自己嗎？在我的記憶裡，這是一個和我非常陌生的臉孔。他不但老而瘦，並且是這樣的憔悴不堪！皮膚皺癯而枯燥，眼睛陷下去，眼圈一痕青紫，眸子是暗的，過去有些渾圓的兩腮，卻因數年來消化器官變弱，一日三餐的咀嚼運動，顎骨張出，幾乎變成了四開面孔。……難道這三年來某些地方的生理障礙，竟會破壞了整個身體機構而使之變形嗎？難於相信的！<sup>57</sup>

個人建構自我形象是擁有自主權的，故自我認同的觀念能協助思考個人對污名的感覺和管理。<sup>58</sup>鍾理和以身體面容的驚悚變化與主觀反應，刻劃疾病的影響不僅是生理機能的衰失，更造成精神上的自我懷疑。三十六歲的他對著鏡中的人已經認不出來是自己，難以相信眼前所見的我正是最深刻的打擊，作家對自我形象喪失認知，產生了斷裂隔絕。

主體性經常是在不平衡的權力關係中掙扎而生，鍾理和的生命與書寫即為一場主體覺察的實踐。縱然療養矯正過程中作家產生個人生命、身心意識、自我價值與常軌生活的斷裂和懷疑，卻也藉此省視自我的主體價值與人我關係；此外，於身心斷裂的狀態中以書寫直面痛苦且持續尋求治療，日後更將此段經歷轉化為小說題材的創作行動，皆證明鍾理和不畏展現他面對疾病、手術和漫長療養的各階段心緒變化。「健康」涉及經濟、社會與文化資本的擁有程度，鍾理和在喪失身體掌控權的狀況下，積極追求療養和書寫的資本以構築自我價值。當手術功效發揮，病情得到明

<sup>56</sup> 鍾理和：〈致鍾肇政函〉，《新版鍾理和全集7》，頁39。（1958.5.20）

<sup>57</sup> 鍾理和：《新版鍾理和全集6：鍾理和日記》，頁126-127。（1950.4.28）

<sup>58</sup> 高夫曼著，曾凡慈譯：《污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頁106-107。

顯改善之後，鍾理和叮嚀自己保重健康而於日記留筆「這是我的新生！」<sup>59</sup>，表達對重生的深切希望。可以說鍾理和的療病日記是一部透過身體病態和苦難經驗，以解構疾病、標誌自我以重組主體的生命史。

#### 四、病體的除魅：鍾理和文學的疾病再現與污名旁觀

鍾理和認為小說的構成包括人物、事件與背景，背景是寫作的場所或空間呈現，尤其現代的生活記事是以「背景」決定人物和事件的發展。<sup>60</sup>重視背景設定的寫作觀影響其對療病生活的寫作，第一人稱敘事之作〈十八號室〉、〈手術臺之前〉，與記述他人病痛的〈閣樓之冬〉、〈楊紀寬病友〉等篇<sup>61</sup>，皆以手術室、病房、療養院等醫療空間展開事件和人物、情節的描寫。本節所謂「除魅」(disenchanted)意指作家透過對肺結核病癥及鮮為人知的療養過程(包括病患內團體的人我關係)之剖析，展現患者抵抗疾病、身分正名的能動性，以破除肺病等同死亡而不可違逆的負面象徵。本節將以鍾理和日記的疾病敘事為基底，針對上述由作家疾病經驗所延伸的諸篇創作，綜論作家對疾病療養的記憶再現及文學詮釋：

##### (一)「體」現疾病：醫學專制與身體除魅

鍾理和是 1946 年 3 月底搭乘難民船，自天津、上海到基隆，4 月 14 日抵達高雄。睽違原鄉臺灣八年的作家，內心充滿對家國歸返與身分定位之未定的雙重焦慮，且離散的處境容易產生土地、文化認同上的思念、追尋情感，加諸返臺後長期對抗疾病的生命經歷，故鍾理和戰後文字夾雜的不單是對國族、自我境遇的感嘆，還有

---

<sup>59</sup> 鍾理和：《新版鍾理和全集 6：鍾理和日記》，頁 148。(1950.10.14)

<sup>60</sup> 鍾理和：〈致廖清秀書簡〉，《新版鍾理和全集 7》，頁 120。(1957.5.30)

<sup>61</sup> 鍾理和將〈楊紀寬病友〉、〈閣樓之冬〉分類為同題材之作，〈楊紀寬病友〉原暫名為〈楊紀寬〉，預計投稿聯副報刊的星期小說欄，1960 年 7 月發表於《晨光》雜誌。參見鍾理和：〈致鍾肇政函〉，《新版鍾理和全集 7》，頁 99、106。(1960.3.4、1960.7.3)

飽受生活重壓的苦痛，和困於身體病痛的苦悶煎熬。〈祖國歸來〉即提及戰後臺人的難題除了生活經濟，還有精神打擊與生命苦悶。內外交迫的處境下，鍾理和接連面對肺結核的病痛和長期的療程，可想而知其身心的挫折困頓。

不論是〈十八號室〉或〈手術臺之前〉，其內容原型皆根基於 1947 至 1950 年的療病日記。疾病作為一種生命現象，而身體又是表達生命中個人慾望、感性經驗的場域，為言說自己的方式，因此疾病書寫的許多現象和文本都與身體直接相關，作為具有反思性和解構性的視點。<sup>62</sup>探究鍾理和文學中對身體感知或反應的描寫，一方面可呈現人對社會和文化的調適，另一方面則展示社會與文化及其物質、概念對人的塑造，並彰顯病我對社會權力結構的批判。〈十八號室〉是 1950 年的未完稿，其命名意涵和〈手術臺之前〉同樣取於與肺病療養相關的空間事物——病房號碼。〈十八號室〉篇名下另取「指甲的故事」，敘事者由口袋裡九片指甲勾起病院生活的記憶。由於是未完稿，僅能見出敘事者、小田教授與另一名熱心醫生為主要人物。<sup>63</sup>鍾理和直接將身體部件變為情節關鍵物，指甲一則象徵他感謝醫生的一段過往，一則是映襯小田教授對病患輕佻、忽視的態度，呼應鍾理和日記裡對醫病不對等關係的描述。

「身體」在鍾理和的疾病書寫中具有中介作用，表述了作家的自我看待，以及和社會的互動關係。鍾理和透過診療過程的細節呈現病體藉由症狀、外在跡象與口頭問診等方式構築形象，此身體描繪過程再搭配 X 光予以解讀，患者變成醫生診斷凝視下的順從者<sup>64</sup>，逐步呈現病人處境的不堪：

院長來複查。他把 X 光照片拿到自玻璃窗透進來的光線下晃來晃去，一張一張看下去，稍微歪著頭。

「哼！哼！」他點點頭滿足地說，目光依舊注在照片上。「好得多了。只要這個空洞想個法子……哼！哼！」他再點點頭，然後指著照片右胸上肺尖部給

<sup>62</sup> 李蓉：《中國現代文學的身體闡釋》（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頁 341-343。

<sup>63</sup> 對比療病日記、〈手術臺之前〉的描述，熱心醫生應指林新澤醫生，1950 年 4 月 29 日鍾理和日記曾敘述林醫生下個月將被派到嘉義防治中心工作。

<sup>64</sup> 〔澳〕克里根（Kate Cregan）著，謝明珊譯：《身體社會學：體現的抽象化描繪》（臺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公司，2011），頁 76-79。

身傍的林主治醫師看，說道：「這地方再做一下子，就好了！」<sup>65</sup>

被觀看可謂患者在身體創傷外的最大精神痛苦，患者往往對此抱以拒斥態度，卻也將這些負面內化為自我的一部分。<sup>66</sup>醫學凝視是描繪看得見且可理解的表面症狀，牽涉言說和觀看的抽象聽、視覺過程。<sup>67</sup> X 光片（透視）是肺病診療重要的依據，剝除隱私且一覽無遺的展現人體，然院長卻在窗邊晃擺照片檢視，比起人就在現場的病患，院長始終專注於 X 光片和主治醫師的談話。對於事關病患性命的手術，院長更以「做一下」一語帶過。事實上，患者可能遠比醫者自身還更仔細聽取醫者對疾病狀態的陳述評判，因為病人一向期許醫者的診斷技術、有效的治療、還有認識患者的痛苦。<sup>68</sup>然而引文描述的动作、視線、談話無一不顯示醫生對病患身體的操控和怠慢，身為病患的敘事者主體全然處於孤立無援且邊緣化的被動狀況。

〈手術臺之前〉原名為〈爬上手術臺之前〉，作者刪去「爬上」二字，寫有二份皆未完稿的原稿，較為完整者為 3 月 28 日至 4 月 27 日的版本，另一版為舊版全集未收錄之 4 月 16 日至 5 月 11 日。<sup>69</sup>內容圍繞於接受手術前的心路歷程，形式採逐日記載至敘事者手術當日，篇名意義可追溯日記所述予以考究：

在這樣的世界，我們不可能有多大的期待，必須自求解決之道。所以解剖刀帶來的，雖也可能是死，而病友們卻都一個個的終而必須**爬上手術臺**去，他們不怕開刀麼？不畏痛苦麼？怕的，畏的，不但如此，他們還知道據醫學的統計，由此道得救的人，只能佔半數而已。可是他們為了自己，更大的為了別人，必須使自己勇敢起來，看著隨在護士後面向手術室走的他們的背影，那不但是悲壯，而又是那樣的寂寞。可是除開身歷其境的人，是不會知道此種心境的。<sup>70</sup>（粗體為筆者所加）

<sup>65</sup> 鍾理和：〈手術臺之前〉，《新版鍾理和全集 5》，頁 307。

<sup>66</sup> 孫小玉：〈卡蘿的疾病誌：失能主體的思辨〉，《文化研究》15（2013.3），頁 59。

<sup>67</sup> 克里根著，謝明珊譯：《身體社會學：體現的抽象化描繪》，頁 74。

<sup>68</sup> 李宇宙：〈疾病的敘事與書寫〉，頁 54。

<sup>69</sup> 《新版鍾理和全集》收錄的第二版接續第一版後半時間，部份日期重疊而內容不同，整體記述較簡略，同樣出現病友相關敘事，包括退院的葉病友、已開刀渾名鮮大王的病友、甫開完刀的吳病友。由於第二版內容與日記所載極為相近，故此節以創作性高的第一版為分析文本。

<sup>70</sup> 鍾理和：《新版鍾理和全集 6：鍾理和日記》，頁 142。（1950.5.10）

病患對病情難免抱持僥倖心理，但〈手術臺之前〉裡醫生總是強調手術是不可避免的，將這份觀望無情的打碎。接受手術看似是病患唯一的自救之道，然這選擇背後是充滿寂寞、悲壯的身影寫照，原初篇名「爬上」一詞的使用更襯托病患面對生命的無可奈何和掙扎之弱勢處境。疾病經驗除了被鍾理和用於日記自我內在對話的日常習作，尚有向外界表達反身性（reflexivity）訊息的主觀詮釋。

此作敘事設定是預計接受胸廓成形術的第一人稱「我」，敘事焦點相對集中於手術一事的思考想像，尤其是手術對身體所造成的生理耗損及精神刺激，並夾雜與楊、紀、胡姓病友的談話：

在二六號室紀病友揭開上衣後部讓我們看他開刀後的疤痕。他開了二次刀，切去七條肋骨。我看後第一個印象是：這個人是完了！

……創口的印有清清楚楚的密密麻麻針線痕，樣子頗淒厲怕人。看上去他的上身祇剩了左邊半個邊兒，另半個邊兒前胸與後背全部塌落，粘成一處，我二手自前後一合，覺得薄得像一張紙，這邊的手掌可以感觸到那邊的手掌，它像飛獸類的翅膜一般，隨著身子的搖動不住扇著。<sup>71</sup>

引文是敘事者形容已經接受手術的病友軀體之段落，畫面極具衝擊性，令敘事者不禁產生「這個人是完了」的消極印象。接受手術本是為了對抗疾病、迎來新生，但是紀病友的軀體已全然崩壞、不成人形。針線痕、薄紙、飛獸翅膜的形容詞全是出自「我」對病體的主觀形容，疾病對患者的折損清晰可見且異常驚人；另一方面，楊病友則視手術為治療唯一辦法，卻因身體狀況始終被醫師拒於手術之外。此篇敘事的一大轉折，便是紀病友在即將接受手術的敘事者和亟欲接受手術的楊病友面前，展露他手術後的殘破軀體。這部分對敘事者心理的衝擊不僅難堪且矛盾，同時呈現受污名者易受傷害與貶抑的不穩定自我。

肺結核是一種消耗身體的慢性病，又與貧窮形成一個惡性循環，通常被想像成貧困、匱乏的病<sup>72</sup>，鍾理和的戰後臺灣生活與前述二者糾纏長久，這問題在小說中亦

<sup>71</sup> 鍾理和：〈手術臺之前〉，《新版鍾理和全集5》，頁309。

<sup>72</sup> 〔美〕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著，程巍譯：《疾病的隱喻》（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頁15。

非孤例。接受手術的決定除了病人本身的自覺、對故有生活眷戀，更重要的還有長期療養費用的沉重負擔，亦如〈手術臺之前〉的胡毓麟病友不想拖累長期接濟他的叔父。楊照指出鍾理和自傳性作品帶有尋找自我、面對生活的文學救贖之焦躁與沮喪。<sup>73</sup> 1947 至 1950 年間的療病日記與其後相關的文學創作，亦見作家對身體衰弱、消耗的刻劃和情緒、精神的沮喪失落，卻也寫下肺病患者全體的持續戰鬥：

全體病友都沈落在不動的安息中，死的靜寂和休止強韌地支配著院子，只有雨聲和雨打在樹葉上嘩啦嘩啦的聲響。但就在這靜寂下面無言的格鬥在進行著，自樓上到樓下，自這邊的角落到那邊的角落，生命在掙扎，在呻吟，在肉搏。<sup>74</sup>

掙扎、呻吟的生命就是無數肉搏、格鬥的展現。患病後的鍾理和以書寫進行一場肉體的疾病「除魅」，將戰後令人聞之色變的肺結核及鮮為人知的療養過程一一剖析，刻劃肺病患者不畏風險、積極抵抗的身姿，以消抵肺結核的威脅感及未知性。作家將疾病視為一個與之共存的客體，既然無法痊癒或根治，就正面的迎向疾病。鍾理和將病症發作和手術思考的過程做了鮮明、具體的全面描繪，以挑戰疾病對於身心靈的全面接管及不可違逆性，奪回對主體的掌控權。易言之，鍾理和以書寫的方式剝除附著在病體表面的恐懼和不安，去除人們對肺結核的無知和污名化，以身體疾病的癥狀解構與矯正治療，重新建構自我生命的主體性與力量。此一疾病敘事所展現的積極抵抗姿態，即鍾理和對受污名化的社會身分缺陷的直接挑戰。

## （二）旁觀他人之痛苦：〈閣樓之冬〉、〈楊紀寬病友〉

肺結核除了外在病徵，又是種牽涉心理因素的內在體驗，故鍾理和的疾病敘事不只呈現身體問題，同時反映其個人的生命狀態。作用於身體的疾病，也是作家意識身體存在的一種方式，只不過通常伴隨著痛苦的負面情緒。時隔九年之後，鍾理和再次審視療病的生命經驗，化做第三人稱的小說題材，這寫作意識究竟是「記錄」疾病的原貌，還是「建構」生命的災難？桑塔格（Susan Sontag）《疾病的隱喻》揭

<sup>73</sup> 楊照：〈「抱著愛與信念而枯萎的人」——記鍾理和〉，《聯合文學》11：2（1994.12），頁 103-104。

<sup>74</sup> 鍾理和：〈手術臺之前〉，《新版鍾理和全集 5》，頁 317-318。

示了疾病如何為隱喻所覆蓋，人們所見的不再是疾病真實的樣貌，而是疾病根植於各時代特殊的文化脈絡與人性弱點之論述。<sup>75</sup>疾病對文化脈絡和人性弱點的隱喻，可得證於鍾理和面對身體因為疾病而失控的事實，經常表現出極度焦躁和家庭負罪感的文字記述。尤其面對肺結核這類長期抗戰的慢性病，加諸戰後臺灣尚未健全的醫療環境及技術條件，致使鍾理和長久處於持續的治療規訓境遇中，作為病患的身體和身分不斷被強化，生命猶如縛上枷鎖。

1960年鍾理和邁入疾病書寫的另一階段，嘗試從療病經歷中客觀抽離、旁觀自我的疾病，以及融會對病友療養生活的觀察，著成〈閣樓之冬〉、〈楊紀寬病友〉。上述二作情節主軸為敘事者對病友的觀察描寫，而非如療病日記般主述己身病痛，另也凸顯患者經常處於「被觀看」的處境。若言鍾理和日記敘述的是污名的個人身分和社會身分的形構與接受過程，〈閣樓之冬〉、〈楊紀寬病友〉二篇則是描繪污名內團體（即和同類型成員所組成的團體）的共同經驗與污名管理，以臨床診斷的文學手法觸及肺病患者的痛處。作家嘗試從第三人角度尋求對身體、疾病和治療的話語所有權，超越疾病和死亡箝制自我的局限。

此二篇也寫醫病關係，但更著重疾病對病者主體而言不僅是孤立的「我」的事件經驗，甚至存有許多患者們的共同經驗、處境，其中涵蓋與血緣親友關係親疏或衝突的變化。如〈閣樓之冬〉邱春木病友與母親之間對於使用特效藥的矛盾，彰顯疾病影響的不只是身體，甚至是人際關係：

「我們兩個人都在拼命，我和我媽，不過我們都快啦！」

……

據說回家後春木洩得很厲害，她還設法給他打兩支邁仙，不過以後春木就不讓她買了。他說反正他不會好了，徒然浪費金錢，她們還要生活呢。他說她們已為他盡了心，就是死了，他也無話可說。<sup>76</sup>

「拼命」意指生命和金錢的拉扯，「快」則是邱病友及其母親都將耗損殆盡。文學的

<sup>75</sup> 蘇珊·桑塔格著，程巍譯：《疾病的隱喻》，頁 5-77。

<sup>76</sup> 鍾理和：〈閣樓之冬〉，《新版鍾理和全集 2》，頁 192、195。

治療作用具有「分享」的特性，書寫者／傾訴者闡說體驗或感受以喚起與他者間的共鳴，並獲取認同，進一步達到真正的深層理解，至此書寫者／傾訴者具有為人所包容接受的釋懷感。<sup>77</sup>〈閣樓之冬〉病友邱春木的母親與敘事者的互動和對話，對鍾理和而言就具上述的治療性。鍾理和住院療病期間，其母親也是日夜隨身照護，極力協助身體狀況維持穩定。這點令鍾理和萬般不捨和感念：「先母即隨床看護，尤於住院數年間不分日夜慇懃照料。每當理和病情轉劇，則或伏枕哀泣或背人流淚，愛子之心無可比擬……。」<sup>78</sup>哀泣、流淚、愛子之心是鍾理和對母親隨侍病側的觀察，病情深刻牽引親子之間的情感。將親情的家人羈絆融入於療病書寫，含有以書寫方式剝除附著在病體表面的恐懼和不安，增添母子溫情和人際互動的柔性去除人們對肺結核的無知、恐懼和污名化。

母親角色在〈閣樓之冬〉有不少出場篇幅，眼淚是其關鍵符碼，邱病友之母在小說流過四次淚水。題目中的「閣樓」成為專屬病友家屬（邱母）的特殊情感空間，閣樓具有孤獨、隱密性之外，還同時與樓下現實的病房世界相連，作者開篇便說明閣樓的存在及其樓梯通往樓下病房的格局。邱母每次探病都會到與病房相連的閣樓哭泣，顯示身處閣樓的人無法脫離樓下病房的愁苦，由題目也可知鍾理和的描寫核心。其中第二回哭泣是邱病友施打特效藥而病情好轉之後發生的：「她俯首拿毛巾揩眼淚，有意避開我的注視，她心中似乎有一種別人所不知道的憂慮和不安。片刻後她抬起頭來向我淒涼地微笑了笑。」<sup>79</sup>小說前半部埋下母子間因肺病治療的抉擇矛盾，淒涼的微笑來自兒子病情趨好與隨之經濟重擔的衝突；除了處理病人人際和情感關係，〈閣樓之冬〉同具鍾理和個人療病史的投影，其一即故事裡昂貴的「特效藥」。鍾理和在文友書信曾提自己的病情得到鏈黴素和外科手術的幫助而好轉，1944年被發現的鏈黴素即早期治療肺結核病的特效藥，為1950年代最有價值的專利藥物之

<sup>77</sup> 余豐：〈傾訴與轉移——醫者眼中的文學療效〉，收入葉舒憲主編：《文學與治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頁149-150。

<sup>78</sup> 鍾理和於1957年9、10月間逢母喪，與文友信函中頻頻感念母親對其北上療病期間的照護。參見鍾理和：〈致鍾肇政函〉，《新版鍾理和全集7》，頁16-17。（1957.10.18）鍾理和：〈致廖清秀函〉，《新版鍾理和全集7》，頁132。（1957.10.17）

<sup>79</sup> 鍾理和：〈閣樓之冬〉，《新版鍾理和全集2》，頁188。

一。<sup>80</sup>第四回的眼淚緊扣〈閣樓之冬〉收束，無法負擔特效藥的邱病友選擇返家療養而病逝冬日。於閣樓哀悼哭泣的邱母和邱病友的病逝過程，鍾理和另以療養院內任北風細雨吹打的油加里樹襯托家屬哀傷和任疾病擺布的處境，深切描繪病患家屬的痛苦和無奈。

鍾理和的疾病書寫經常強調患者「被觀看」的窘迫處境，以及病患周遭人事物的變化。1960年左右的創作視點則由療病日記「我」的自我觀看，轉換為故事人物「我」對他人病痛的旁觀角度，〈楊紀寬病友〉藉由楊病友自我管控的姿態展開敘事者的他者凝視：

他的療養的態度是認真的，徹底的，他遵守著療養生活中他相信對病人有利的各種規則；他的身子躺在床上，頭擱在枕上，都是端端正正的，平直的，不動的，兩手折回來放在胸脯上，也放得整整齊齊，彷彿他要永遠把持下面那顆心，不要有一刻的時間忘記他這時在做什麼。他吃一口飯菜至少要咀嚼五十次以上，讓所吃的東西能夠完全嚼爛，並拌以適量的唾液；飲一口茶水也要在嘴裡攪動一會，使它的熱度能夠順應體溫；他徹底奉行院方規定的安靜時間；打氣腹時他表現著稀有的忍耐和勇敢。總之，在他這些行為裡面有一種道德的亢奮，有一種宗教的虔誠和固執。<sup>81</sup>

敘事者的凝視透過身體的姿態、吃食動作、作息起居、受療態度切入，足見楊病友將自我管制全面內化，一如道德或宗教信仰般的虔誠自制。身體是意志對欲望施予控制的場域，展現人的自尊心。<sup>82</sup>前文提到「控制」是肺結核慢性病患者日常生活的重要課題，引文即藉由「身體控制」表達病人對疾病康復的強烈渴望，也呈現療養

---

<sup>80</sup> 鍾理和：〈致廖清秀書簡〉，《新版鍾理和全集 7》，頁 138。(1957.10.30)：「我北上就醫松山療養院。幾乎有二年間一直在生死邊緣上來回徘徊。……我時時看到隨來服侍我的母親在背人流淚。後來借了鏈黴素之力，接著更借了外科治療之助。病勢轉趨明朗。」特效藥鏈黴素在戰後初期臺灣的流通狀況與價格，參見張淑卿：《防癆體系與監控技術：台灣結核病史研究（1945-1970s）》，頁 4，註 12：戰後初期一條黃金約可換得 8 支鏈黴素，臺灣劑苗皆由上海走私進口，很多病患以賣土地換購鏈黴素治療。相關口述資料轉引自林瑤棋：《我走過了四個時代》上卷（臺中：恒藝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頁 71。

<sup>81</sup> 鍾理和：〈楊紀寬病友〉，《新版鍾理和全集 2》，頁 220。

<sup>82</sup> 布萊恩·透納著，謝明珊譯：《身體與社會理論》，頁 232。

院中病患們被制約的環境與自我意志。

楊紀寬追求康復的手段是無所不用其極的，除了機械般徹底遵守的療養守則，任何關於助益肺病康復的奇怪方式他都願意嘗試，例如用白布勒著腹部、要求醫師氣腹加壓、極度渴求開刀等自我苛待。〈楊紀寬病友〉的敘事者跳脫己身病患的身分，一旁批判楊紀寬這種違反自然的做法，更敘述這種不近人情尋求治癒的執著態度連帶影響其他療養病患的心境；而這個療養故事裡也有個不眠不休隨身照顧的女性——妻子玉霞，她為了照顧丈夫只好把女兒寄養岳家，一家分離，心中壓抑許多情緒和壓力。楊紀寬對病情近乎格鬥的堅持正來自妻子的支持，和欲與女兒一家團圓的動機。然而〈楊紀寬病友〉後半情節急轉直下，縱然楊本人恪守療養守則卻仍不敵病魔的摧殘，凸顯了生命無常，亦刻劃肺病患者異於常人的精神意志。

鍾理和日記之外的疾病書寫分為兩類敘事方式：〈十八號室〉、〈手術臺之前〉是以第一人稱探究主體「我」面對疾病的心境；記述他人病痛的〈閣樓之冬〉、〈楊紀寬病友〉則將敘述對象轉移至病友身上，由他者的身體變化和肉眼可視之動作、心理可感受之精神，呈現疾病的延伸影響與肺病患者的共同處境。疾病不僅意味著受難，也有中斷正常生活的意義。鍾理和對於己身和他者疾病的紀錄與重述，乃具有釐清疾病的前因後果，尋找離開療養院後與肺病共存的生活意義，就此層意義來看是種由書寫展開積極的心理干預或主體性建構，對疾病施行話語權的除魅及病我主體的檢視組構。

## 五、結論：與疾病共存的新生

戰後以來鍾理和面對國族身分的被分類、經濟生活的需求和疾病的療癒等問題，這種穩定自我生活、流徙與再安置的過程，使鍾理和持續處在外在與內在的擠壓與衝突之中，從而產出的書寫既是邊緣也是中心，成為一種複雜的敘事模式。書寫成為作家自我闡述、修復和自我凝視的具體行動，表現的書寫心理是由非日常到日常、

對安定生活、家庭平穩的渴望。加諸患者面對疾病本會自然產生傾訴和宣洩的需求，於是鍾理和透過疾病以日記紀錄的方式進行生命狀態的內在省視，並藉由文學的創作、重述以省思疾病與個人生命、社會文化間的關係。「疾病」對鍾理和而言既是種切身的主觀存在，也是對自我處境的文化和社會建構的文學借喻。因此，他的疾病書寫活動不再是簡單複製或傳達物質現實，而是由肺病記述與再創作，表達身體經驗與私語言說相互辯證下的主體覺察和建構自我的動態敘事。一如作家撐過手術考驗後於日記所呼告的「這是我的新生！」是為歷經重重生命頓挫後的主體性詮釋。

鍾理和文學的肺病文本包括病中日記、療病後小說、未完稿及書信，呈現疾病世界內身體經驗及互動秩序的生命情境。作家病中日記的寫作模式由景而人事，推移至療病狀態或重要事件的紀錄、感想，連帶呈現個人的文學書寫及閱讀活動，建構他的時代感與社會關連，表現了解構疾病以營構常態／健康生活的作為，同時流露個人生命史與日常時間、身心意識與周遭環境、自我價值與認同的多重斷裂；從日記到療病後小說一貫延續「身體說話」的敘事模式，正面迎向、刻劃疾病，剝除社會大眾冠予病患社會身分的恐懼、歧視和不安，解開人們對肺結核的無知和污名化，建立病人發聲的話語權。〈閣樓之冬〉、〈楊紀寬病友〉進一步將視線聚焦病患的人我關係之變化，打破疾病是孤立的「我」的事件經驗之概念，而存有患者們內部的共同經驗。承前所述，鍾理和的疾病書寫是由具傳染性的肺結核病人之污名主體出發，其療病日記考掘病體生命處境與社會日常的斷裂疏離，為訊息控制與個人身分的展現。至下一階段的小說創作，視域則擴展至病患內團體與自我認同，融會自身與他人病痛經驗，呈現偏離於社會世界的病院牆內者，以及內團體偏差者的邊緣狀態。

「身體」是自然秩序與文化秩序在人身上的會合點，是所處環境和文化中介的一部分。<sup>83</sup>身體即個人經驗展演的載體，鍾理和疾病主體的「自我」不僅建構在「關係」中，更透過身體來理解個人與生活世界的關係。在他的疾病書寫中，「身體」是病患主體性的象徵、敘事話語的場域，也是一種社會詮釋的方式或產物。鍾理和以

<sup>83</sup> 布萊恩·透納著，謝明珊譯：《身體與社會理論》，頁 60。

疾病書寫宣示自我的生命態度，採用身體式的術語表達了對應個人和社會的痛苦：背德者、敗家子、殘廢者的負罪枷鎖，讓他長期處於一種對抗狀態，向內力抗帶有恥辱烙印的肺結核疾病，向外則對抗社會價值對於同姓婚姻、家庭責任的病態批判。在他的疾病書寫中身體覺察成為標誌自我、建構主體的方式，透過再現疾病對身體狀態、思想情感、日常生活所產生的衝擊，身體的崩陷毀壞反而成為鍾理和創作的動能和生命狀態的深層力量。易言之，作家利用文學語言解構自我生命經驗中的常駐異己——疾病，將非規範性的疾病經驗融入生活世界。他以未痊癒的殘缺身體對抗疾病或協商的療養日常，回應了所謂正常社會秩序中的身分常規，從而獲取修復身心的自我救贖與主體重構之空間。

## 徵引文獻

### 一、原典文獻

鍾理和、鍾肇政著，錢鴻鈞編：《臺灣文學兩鍾書》，臺北：草根文化出版社，1998。

\* 鍾理和著，鍾鐵民編：《鍾理和全集》，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3。

\* 鍾理和著，鍾怡彥主編：《新版鍾理和全集》，高雄：春暉出版社，2009。

### 二、近人論著

\* 王幼華：〈「泰利斯曼」式的創作——以鍾理和為例〉，《臺灣文學學報》12(2008.6)，頁 143-158。

王珮真：《論鍾理和病體與書寫：以文類差異敘事為中心》，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臺灣研究教師在職進修學位班碩士論文，2012。

\* 余舜德：〈「日常生活的身體感」專號導言〉，《考古人類學刊》74(2011.6)，頁 1-10。

\* 李宇宙：〈疾病的敘事與書寫〉，《中外文學》31：12(2003.5)，頁 49-67。

李蓉：《中國現代文學的身體闡釋》，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

林秀蓉：〈與白色瘟疫搏鬥的眾生相——鍾理和疾病書寫探析〉，《高雄文化研究》2005(2005.7)，頁 259-282。

林玲燕：《從書寫治療看鍾理和生命情結的反思與超越》，臺中：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所碩士論文，2006。

林瑤棋：《我走過了四個時代》上卷，臺中：恒藝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

洪玉梅：〈鍾理和「疾病書寫」探析〉，《屏東教育大學學報》25(2006.9)，頁 327-357。

洪玉梅：《鍾理和疾病文學研究》，屏東：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

\* 孫小玉：〈卡蘿的疾病誌：失能主體的思辨〉，《文化研究》15(2013.3)，頁 43-86。

師彥靈：〈「病志」——病患破碎自我的重構〉，《蘭州文理學院學報》3(2018.7)，

頁 81-86。

張淑卿：《防癆體系與監控技術：台灣結核病史研究（1945-1970s）》，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

\* 梅家玲：〈身體政治與青春想像：日據時期的臺灣小說〉，《漢學研究》23:1(2005.6)，頁 35-62。

陳金燕：〈自我覺察在諮商專業中之意涵：兼論自我覺察督導模式〉，《應用心理研究》18(2003.6)，頁 59-87。

陸坤泰：〈化學藥物療法之前的結核病治療〉，《防癆雜誌》秋季號(2013.9)，頁 6-11。

彭瑞金：《鍾理和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楊照：〈「抱著愛與信念而枯萎的人」——記鍾理和〉，《聯合文學》11:2(1994.12)，頁 102-105。

雷祥麟：〈衛生為何不是保衛生命？民國時期另類的衛生、自我、與疾病〉，《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4(2004.6)，頁 17-59。

葉舒憲主編：《文學與治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蔡慧崑：〈鍾理和的生命觀照——以日記為主的探討〉，《南亞學報》37(2017.12)，頁 266-299。

\*〔英〕布萊恩·透納(Bryan S. Turner)著，謝明珊譯：《身體與社會理論》，臺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公司，2010。

\*〔美〕高夫曼(Erving Goffman)著，曾凡慈譯：《污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臺北：群學出版社，2010。

\*〔美〕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著，程巍譯：《疾病的隱喻》，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

〔澳〕克里根(Kate Cregan)著，謝明珊譯：《身體社會學：體現的抽象化描繪》，臺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公司，2011。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Bryan S. Turner, *Shen Ti Yu She Hui Xue Li Lun* [The Body and Society: Explorations in Social Theory] trans. by Hsieh Ming Shan (Taipei: Weber Publication, 2010).
- Chung Li Ho, *Xin Ban Zhong Li He Quan Ji* [A New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Zhong Li He] ed. by Zhong Yan Yi (Kaohsiung: Chun Hui Publish, 2009).
- Chung Li Ho, *Zhong Li He Quan Ji* [The Complete Works of Zhong Li He] ed. by Chung Tie Min (Taipei: The Hakka Affairs Council, 2003).
- Erving Goffman, *Wu Ming: Guan Li Shou Sun Shen Fen De Bi Ji*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trans. by Zeng Fan Ci (Taipei: Socio Publishing, 2010).
- Lee Yue Joe, "Narratives of Medicine and Illness" in *Chung Wai Literary* 31.12 (May. 2003), pp. 49-67.
- Mei Chia Ling, "Body Politics and the Youth Imagination: Taiwan Fiction in the Japanese Period" in *Chinese Studies* 23.1 (Jun. 2005), pp. 35-62.
- Sun Hsiao Yu, "Frida Kahlo's Pathography: Study of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Disabled" in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5 (Mar. 2013), pp. 43-86.
- Susan Sontag, *Ji Bing De Yin Yu* [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 trans. by Cheng Wei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3).
- Wang You Hua, "Literary Creation of "Talisman" Style: Zhong Li-He as an Example" in *Bulletin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12 (Jun. 2008), pp. 143-158.
- Yu Shuenn Der, "The Experience of the Body in Daily Life" i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74 (Jun. 2011), pp. 1-10.